



走近敦煌丛书

ZOUJIN DUNHUANG CONGSHU



主编 柴剑虹 荣新江

ZHUBIAN CHAI JIANHONG RONG XINJIANG

国宝流散

藏经洞纪事



王冀青 著

WANG JIQING ZHU



甘肃教育出版社

GANSU JIAOYU CHUBANSHE



国宝流散

藏经洞纪事



走近敦煌丛书

Zoujin Dunhuang Congshu

主编 柴剑虹 荣新江

国宝流散

藏经洞纪事

CANGJINGDONG JISHI

王冀青 著



甘肃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国宝流散: 藏经洞纪事/王冀青著. —兰州: 甘肃教育出版社, 2007.12

(走近敦煌丛书/柴剑虹, 荣新江主编)

ISBN 978-7-5423-1507-6

I. 国… II. 王… III. 敦煌石窟—考古发掘—史料
IV. K879.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 081786 号

策 划: 黄 强 薛英昭

责任编辑: 朱富明

装帧设计: 徐晋林

图片支持: 敦煌研究院

国宝流散

——藏经洞纪事

王冀青 著

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
www.gseph.com 0931-877323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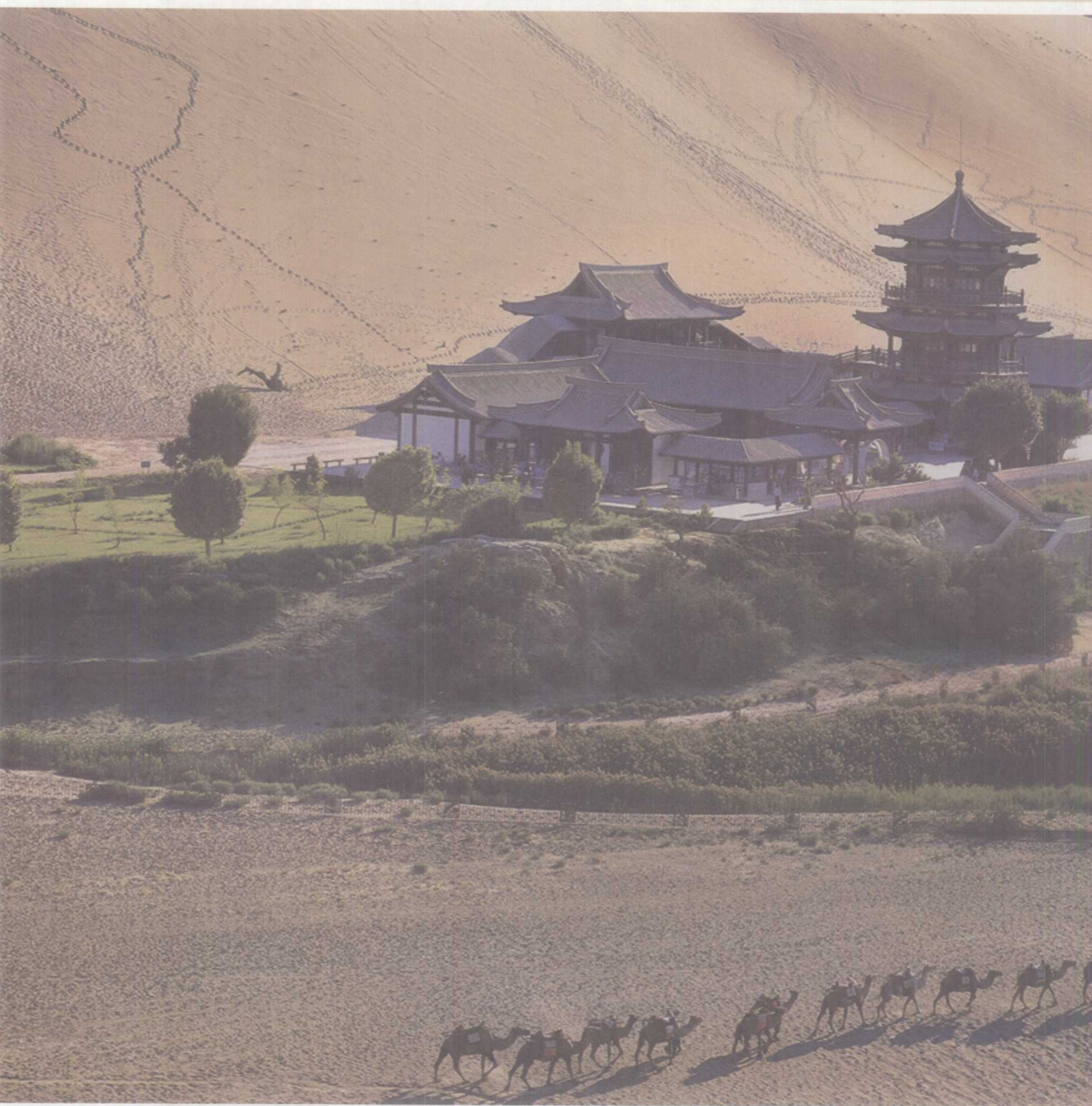
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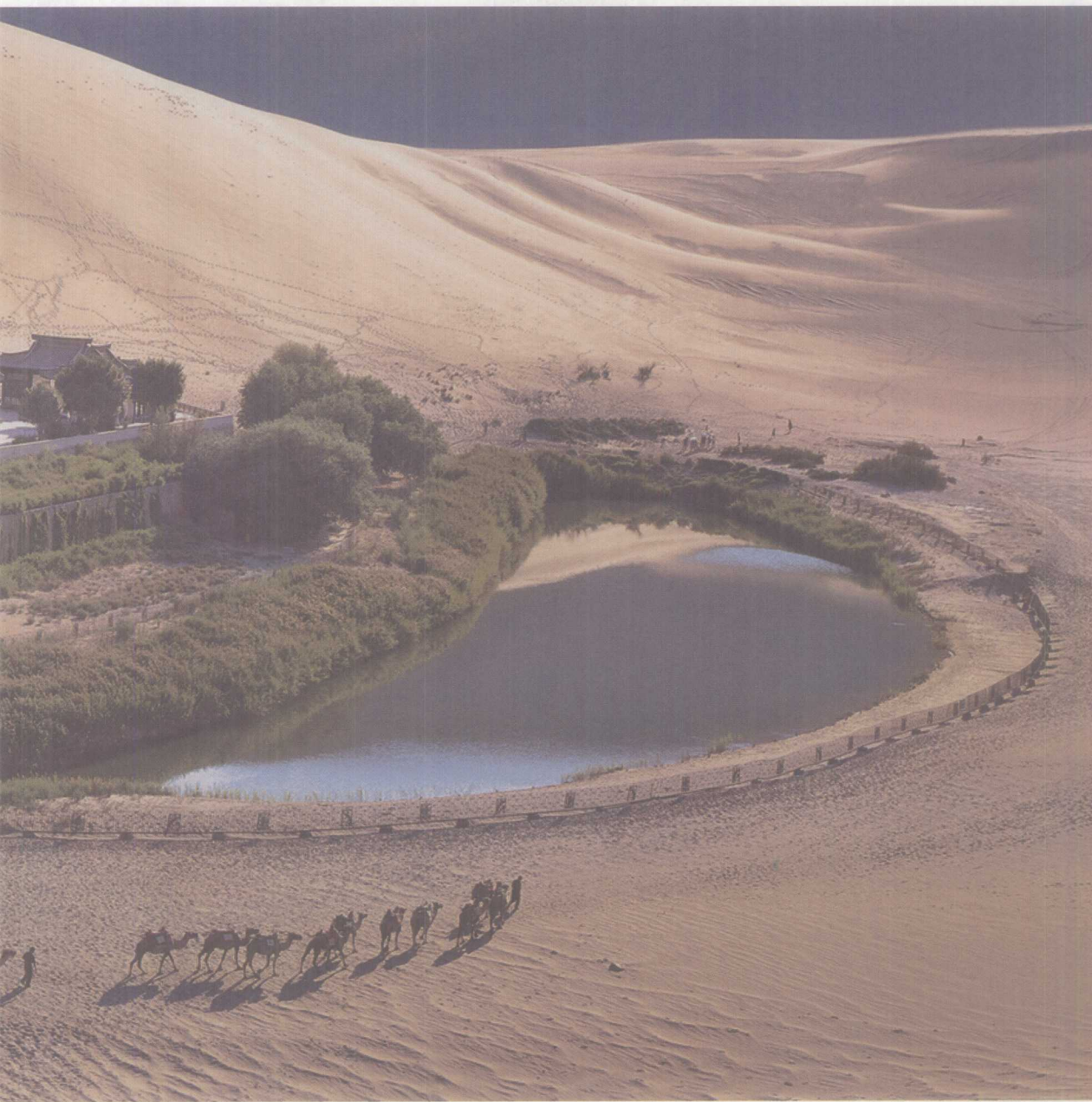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0.75 字数 112 千

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3 150

ISBN 978-7-5423-1507-6 定价: 38.00 元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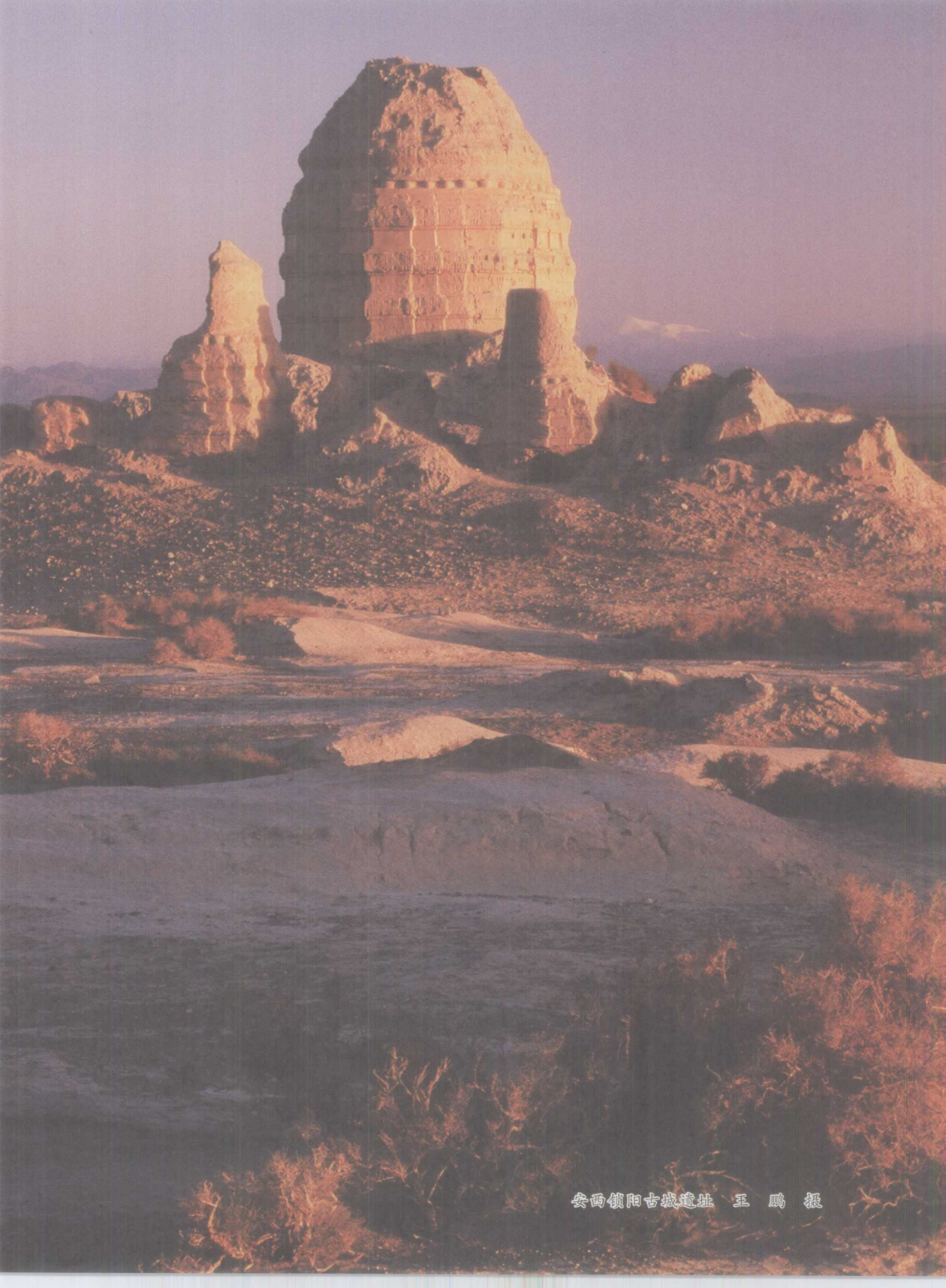
月牙泉 王杰 摄

月牙泉位于敦煌市以南约5千米。在鸣沙山山间，有一泓泉水形似弯月，故名月牙泉。



GUOBAOLISAN

藏经洞的发现，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。藏经洞文物的流散，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不幸，也是中国近代历史背景下的必然结果。



安西锁阳古城遗址 王 鹏 摄



序

姜林

[姜林按]我一向有一个习惯,我从不把别人用我的口气写成的文章,拿过来,签上自己的名字,据为己有。我认为这不是有道德的行为。但现在我想破一次例。我读了大概是出于柴剑虹、荣新江等学友笔下写出的“走近敦煌丛书”序,我读了几遍,觉得即使我自己动手写也不一定达到这个水平。因此我就把文章拿过来据为己有,同时又昭告天下,说这不是我写的文章。我觉得这样做,是很有道德的行为。

五年前,我曾经为甘肃教育出版社的“敦煌学研究丛书”写了一篇序言,表达了对新世纪之初我国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的欣喜之情,也表示愿意继续为敦煌学研究奉献微薄之力。现在,甘肃教育出版社即将推出一套“走近敦煌丛书”,仍征序于我。我这个老拉拉队员当然是应该再鼓吹几句的。

先说这套丛书之名。名曰“走近”,颇有讲究。“走近”乃是“走进”的必要过程与前提条件。自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列入“世界文化遗产名录”以来,敦煌声名日隆,前往那里旅游参观的人络绎不绝,怀着“朝圣巡礼”之心者有了更多瞻仰敦煌的机会。但是,对于并不专门从事敦煌学与敦煌历史文化研究的人来说,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还是免不了有隔雾看花的感觉,要看懂并在心灵上真正亲近敦煌实属不易。这套丛书的策划者就是希望能通过图文并茂的内容与形式来



普及敦煌的学术文化,让读者能够与敦煌渐行渐近,相知相亲,为能真正进入这个辉煌灿烂的艺术宝库与文化圣殿奠定基础。

再说这套丛书的编著者。甘肃教育出版社委托柴剑虹、荣新江来主编这套书,亦属精明之举。我与他们二位熟识多年,知道他们一直热心于敦煌学与敦煌文化的普及工作,堪当此任。二位长期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,都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中坚力量,与老中青三代的众多敦煌学家又有密切的联系和良好的关系,组稿便非难事。而且一位是中华书局的编审,一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,都有敦煌学的著作问世,兼有编书、教书、写书的深切体会。这套书的作者,更是以活跃在科研与教学阵地的中青年学者为主,而且几乎都是敦煌某一专业领域或课题范围的领军人物,由他们来撰写敦煌学的普及读物,引领读者走近敦煌,也是很合适的。

谈到普及读物,我还要发点感慨:写好、出好一本普及读物,其难度是一点也不亚于那些高深的学术专著的。内容要准确,材料要翔实,语言要通俗易懂、生动活泼,还要有化繁为简、深入浅出的本领。像这套丛书,配了许多图片,当然还要求图与文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。这些说来容易、看似轻松的特点,对我们的作者和出版社却是相当严峻的挑战。好在甘肃教育出版社有这方面的经验与优势,可能也不乏“成功之母”的教训;主编之一的柴剑虹又曾长期负责编辑倡导“大专家写小文章”的《文史知识》杂志,并且承担了丛书中一本书的写作任务,应该也会以自己的见解、感受与文字去与其他作者切磋、推敲。两者结合起来,一道应对挑战,为宣传与普及敦煌学知识积累经验,我以为也是出版这套丛书的意义之一。

2007年11月20日

前言

所谓“藏经洞”，一般特指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一个近代发现的小小洞窟。按照现行莫高窟编号体系，藏经洞被编为莫高窟第17窟。该窟是100多年前才被发现的，因发现时洞内藏满了古代写本经卷等文物，故此后俗称“藏经洞”。

藏经洞所在的敦煌莫高窟，近代多称“千佛洞”，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东南约25公里处。莫高窟首开于前秦建元二年(366年)，第一个凿洞者是沙门乐僔，第二个凿洞者是禅师法良。从此以后，莫高窟经历十六国、北朝、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西夏、元等各个时期，直到1368年(元至正二十八年)，千余年间，开窟不断。莫高窟南区现存492个洞窟，窟中有彩塑2000多身，壁画45000平方米。

藏经洞是莫高窟南区492个洞窟中的一个，位于莫高窟第16窟的甬道北壁，开凿于晚唐，坐北朝南，大致是个方形窟。(图1，图2)藏经洞地面四边的长度是：东壁2.75米，北壁2.84米，西壁2.65米，南壁2.83米。由于四壁略向窟内倾斜，四壁顶部的长度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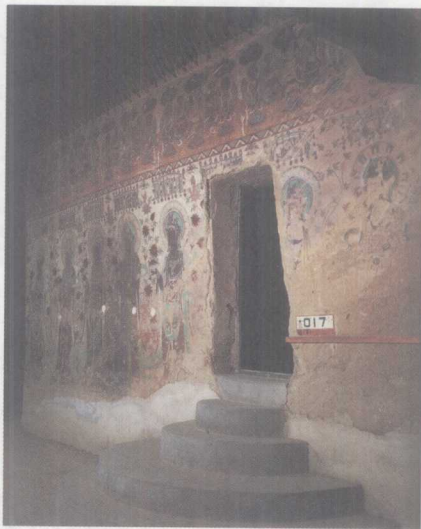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从莫高窟第16窟前室看到的藏经洞口。(NHK取材班編『写真集・シルクロード』,I,長安・河西回廊・敦煌,第72幅。)





图2 从莫高窟第16窟主室看到的藏经洞口。(高德祥编著《敦煌·丝路》，第149页。)



地面四边不等：东壁 2.49 米，北壁 2.55 米，西壁 2.57 米，南壁 2.46 米。推算下来，藏经洞地面东西平均长度为 2.835 米，南北平均长度为 2.7 米，面积大约是 7.65 平方米。藏经洞四壁的高度也不一致：东北角高 2.38 米，西北角高 2.46 米，西南角高 2.32 米，东南角高 2.37 米，4 个角的平均高度是 2.38 米。藏经洞的窟顶为覆斗形，本身高约 0.5 米。考虑到藏经洞下大上小、上有覆斗形窟顶等因素，洞内的容积大约在 19 立方米左右。（图 3，图 4）

藏经洞隐身于其中的莫高窟第 16 窟，是一个开凿于晚唐的大洞窟，在宋朝或西夏时重修，清代再次重修。莫高窟第 16 窟，因其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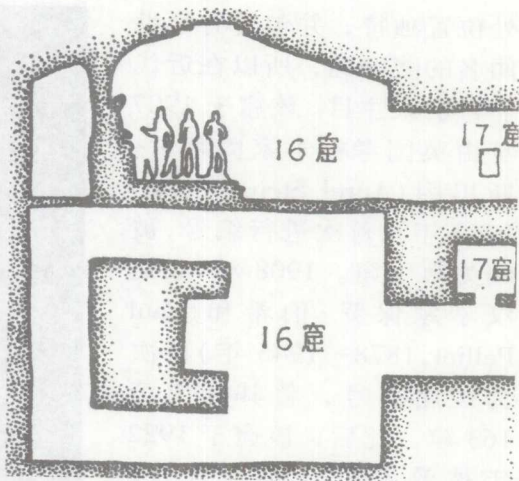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 莫高窟第 16 窟平面图与剖面图，及藏经洞（莫高窟第 17 窟）的位置。（马世长《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》，图 1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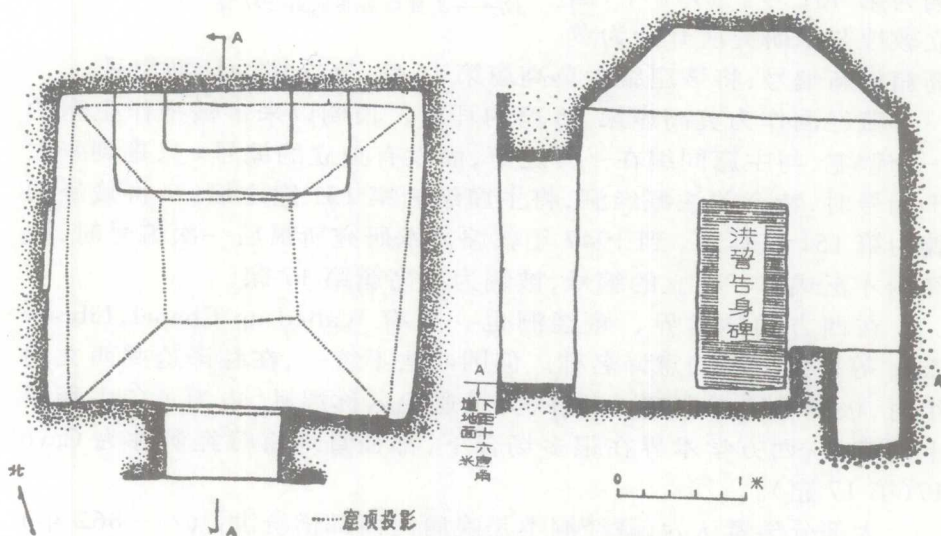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4 藏经洞（莫高窟第 17 窟）的平面图与剖面图。（马世长《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》，图 2。）



处位置独特，并包含有举世闻名的藏经洞，所以在近代非常引人注目。该窟于1907年由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·斯坦因(Aurel Stein, 1862—1943年)首次进行编号，被编为第1窟。1908年，法国汉学家保罗·伯希和(Paul Pelliot, 1878—1945年)再次为该窟编号，将其编为第163窟。此后，该窟于1922年被敦煌官厅编为第288窟，1935年被国民政府官员高良佐(1907—1968年)编为第10窟，1942年被画家张大千(1899—1983年)编为第151窟，1943年被美术史家史岩(1904—1994年)编为第401号。1947年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为莫高窟重新编号，将该窟编为莫高窟第16窟，至今成为标准窟号。

藏经洞作为莫高窟第16窟的耳窟，长期以来多被视作主窟的一个壁龛，与主窟同编在一号之下，而没有独立的编号。只是到张大千编号时，特意关注藏经洞，将主窟编为第151窟之后，又将藏经洞编为第151窟耳窟。到1947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最后一次编号时，藏经洞才正式有了独立的编号，被编为莫高窟第17窟。

在西方的学术界，藏经洞也一直有 Walled-up Chapel、Library Cave 等种种不同的意译名称。但因叫法不统一，在翻译这些西文词组时，极易造成误解。现在，为了避免名称混乱，也为了免去翻译上的麻烦，西方学术界在很多场合下，都径直地将藏经洞称为 Cave 17(第17窟)。

大部分学者认为，藏经洞本是晚唐河西都僧统洪誓(?—862年)的禅窟。(图5)洪誓圆寂后，这个小洞窟又成为他的影窟(纪念堂)。在



图5 洪誓塑像。(吴健摄影、解说《艺术的敦煌——吴健摄影集》，第297幅。)



11 世纪初某个至今尚未确定的时间,因为某种至今尚未辨明的原因,这个小洞窟被当作敦煌寺院贮藏图书、法器的密室,而秘密地封闭于莫高窟第 16 窟甬道的北壁之后。封闭者在封闭藏经洞时,先将贮藏物逐渐地填满洞窟,再将入口处用泥砖封堵。泥砖之外,又涂抹上一层灰泥,使藏经洞口与主窟甬道北壁的其他部分平整如一体,从外观上几乎看不出凹凸异样来。最后一道工序,是在整堵墙壁上绘制壁画,意图是使局外人想不到,墙壁之后竟有藏经洞的存在。

藏经洞封闭后,封闭者要么守口如瓶,要么死于非命,要么逃往他乡后一去不归,反正藏经洞的秘密一直被保守了近 9 个世纪的时间,直到清朝的末年。在 19 世纪末或 20 世纪初的某个时刻,藏经洞才被道士王圆禄(1850?—1931 年)等人偶然发现。王圆禄发现藏经洞后,洞内文物很快便经过他的手,在国内外流散开来。本书的主要内容,便是以藏经洞和王圆禄为两条主线索,介绍藏经洞的发现经过和藏经洞文物的流散经过。

藏经洞的发现,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。藏经洞文物的流散,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不幸,也是中国近代历史背景下的必然结果。1930 年,学者陈寅恪(1890—1969 年)在为陈垣(1880—1971 年)所编《敦煌劫余录》写序时,记录下当时人的一种说法:“或曰:敦煌者,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。”其实,这种说法既是当时许多人的真实感受,也是百年来许多中国学者的真实感受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,藏经洞文物流散的惨痛历史逐渐离我们远去。但这段历史一定不会被淡忘,它带给中国人民的伤痛感一定会永远伴随这个民族。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逐渐复兴,中国人民越来越思念流散到海外去的藏经洞文物,也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亲自保管自己祖先留下来的这批珍贵遗产。

另一方面,正是由于藏经洞文物向全世界各地的外流,才使得敦煌名扬天下。世界各国对藏经洞文物争相研究,进而导致 20 世纪上半叶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所谓的“敦煌学”。“敦煌学”一词,最早由日本语言学家石滨纯太郎(1888—1968 年)于 1925 年在大阪怀德堂夏期讲演《关于敦煌石室遗书》中使用。“敦煌学”以敦煌藏经洞文物为基础,但研究对象从一开始就包括整个亚洲中部地区的文物古迹,大致相当于“中亚考古学”。正是由于藏经洞文物给国际东方学界带来的震撼,才激发日本人拿“敦煌”这个地名来“以地命学”,



发明了“敦煌学”这样一个笼统、模糊的俗称，而且沿用至今。

藏经洞可谓天下第一洞。相信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小小岩洞能像藏经洞一样，招引来全世界无数学者竞折腰，为它出版发表了成千上万种图书和文章。关于藏经洞，关于藏经洞文物，关于藏经洞文物的流散，都是所谓“敦煌学”要涉及的基本内容。而对于这些话题，世界各国的“敦煌学家”已经高谈阔论了 100 年。

但是，关于藏经洞的发现，关于藏经洞文物的外流，关于敦煌县乃至甘肃省各级政府对于藏经洞文物的态度，关于外国探险家与敦煌等地方官府之间的交往等等，至今看不到能一锤子定音的中文档案资料，处处都存在着疑问。原因很简单：关于这些历史事件的原始档案，早已被无知的先人们付之一炬，许多问题遂成千古之谜。

藏经洞文物虽然流散了，但毕竟只是换了一个藏身的国家或地方，并没有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掉。而关于藏经洞的中文档案一旦被烧毁，许多历史真相就灰飞烟灭了，再也不可能复原。藏经洞文物的流散和藏经洞档案的毁灭，这两件事情同样让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感到伤心，真是伤心复伤心！

然而伤心归伤心，却还是不应该灰心，而且要更有信心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终会有志士寻找到在别处保存的已毁档案抄件。而对于今天研究和宣传敦煌的人来说，眼下的工作还是要做，故事还是要讲，写书的任务还是要完成。于是，当甘肃教育出版社让我为“走近敦煌丛书”写一本关于藏经洞的通俗小册子时，我也鼓起勇气接受了下來。

藏经洞的故事，已经被国内外、圈内外的先贤们反复讲述了无数遍，相关内容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常识。该说的话都已说过，该写的书都已写就，甚至连该想到的题目都差不多已用完，想老调重弹也不容易。我才疏学浅，能力有限，这本书既没有通俗读物的流畅文笔，又缺乏学术著作的严谨体系，请读者原谅。出版社规定的字数篇幅较小，章节有限，许多有趣的事情写不进去，譬如像藏经洞封闭问题之类的重要内容，最后就找不到供专写的地方了。由于丛书统一要求不加注释，虽书后列有参考文献，但书中引用前贤原话或观点时，还是无法准确表达具体出处，有掠美之嫌，使我倍感不自在。由于档案依据不足等原因，书中到处都是没有讲清楚的地方，或是讲错的地方。所有这些缺憾，只能容我将来再找机会加以弥补和纠正了。



目 录

前言	1
王圆禄与藏经洞的发现	1
王圆禄的来历	1
王圆禄定居莫高窟	7
王圆禄在莫高窟的修复活动	14
王圆禄发现藏经洞的经过	20
王圆禄发现藏经洞的时间	25

藏经洞文物的早期流散	30
藏经洞文物在地方官员间的流散	30
甘肃省府对待藏经洞文物的态度	33
藏经洞文物向省外的流散	38
最早获得藏经洞文物的外国人	42
虎视眈眈的西方考古学家	45
斯坦因与藏经洞文物的大规模外流	51
斯坦因来到敦煌	51
斯坦因进入藏经洞	57